

CSSCI 来源集刊

全球史评论

第十辑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0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新帝国史

- 20世纪的帝国史研究谱系
- 民族的、帝国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流裔
- 奥斯曼帝国与帝国转向
- 近代早期伊比利亚帝国史研究中的帝国概念及其问题
- 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
- 4—6世纪东亚族群的立国与中华空间的延展
- 四裔之地与边地之城：加洛林帝国的边疆与城市
- 帝国日的产生和跨大洋传播（1899—1958年）
- 日本—马尼拉—欧洲：1670年代英国与越南东京之间贸易的流产
- 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森林的影响（1757—1947年）
- 近代夏威夷华人与日本人的经济关系——以种植业、商业和渔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史评论

第十辑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0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新帝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评论. 第10辑 / 刘新成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7961 - 1

I. ①全…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5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2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齐世荣 [美]彭慕兰

编委会 刘新成 夏继果 梁占军

王永平 刘文明 施 诚

陈志坚 孙 岳 岳秀坤

主 编 刘新成

编辑部 岳秀坤（执行编辑）

杜宪兵（书评编辑）

蒋勋蓉（英文编辑）

通讯编辑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

刘永华（厦门大学）

袁 剑（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论 文

- 20 世纪的帝国史研究谱系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3)
- 民族的、帝国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
流裔 阿西娜·赛利亚图(14)
- 奥斯曼帝国与帝国转向 艾伦·米哈伊尔 克里斯汀·M. 菲里欧(51)
- 近代早期伊比利亚帝国史中的帝国概念及其
问题 克里斯蒂安·豪塞尔 霍斯特·皮奇曼(79)
- 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 晏绍祥(103)
- 4—6 世纪东亚族群的立国与中华空间的延展 李 磊(154)
- 四裔之地与边地之城:加洛林帝国的边疆与城市 朱 明(171)
- 帝国日的产生与跨大洋传播(1899—1958 年) 朱联璧(189)
- 日本—马尼拉—欧洲:1670 年代英国与越南东京之间
贸易的流产 黄英俊(208)
- 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森林的影响(1757—1947 年) 孙中华(226)
- 近代夏威夷华人与日本人的经济关系
——以种植业、商业和渔业为中心的考察 杨 捷(249)

评 论

国际古典学新动态

——2015 年柏林“全球化下的古典学”学术

活动报道 王忠孝 赵静一 刘津瑜(265)

书 评

- 评斯特凡·贝格尔《书写国族:全球视野》 李 胜(287)
- 评卡尔·埃嫩克尔等(编)《作为知识网络的荷兰贸易公司》 ... 姜伊威(295)
- 评大卫·夏尔洛《广告帝国: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种族和视觉文化》 施庆花(301)
- 评何伟亚《帝国的安全政府: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知识和帝国建设》 马广路(307)
- 评方德万《与过去决裂:海关与中国近代性的全球起源》 郝维华(314)
- 评德韦恩·韦塞克等《通讯与帝国:1860—1930年的媒介、市场与全球化》 贾 敏(320)
- 评乌里克·希尔曼《亚洲帝国与英国知识:中国与英帝国的扩张网络》 熊月剑(327)
- 评詹姆斯·贝蒂等(编)《生态—文化网络与英帝国:环境史新思考》 张 捷(333)
- 评允娜·斯蒂奇《帝国焦虑与阴谋小说》 王佳鹏(340)
- 评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 魏 涛(347)
- 评 H. M. 斯科特《大国体系的诞生(1740—1815年)》 齐雨昕(356)
- 评詹姆斯·瑞恩《帝国的图像:摄影与大英帝国的视觉化》 杨佳莹(362)
- 评罗斯·G. 福尔曼《中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相互缠绕的帝国》 卞璠璠(367)

学术信息

- 帝国史与殖民史相关学术期刊概览 岳秀坤(375)
- 第四届全球史学术论坛
- “比较帝国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张 捷(380)
- “全球史视野下帝国的网络和节点”学术工作坊综述 陈洪运(383)

全球史合作研究的新实践

——全球史网络巴西圣保罗会议综述 陈金龙(386)

Contents and Abstracts (394)

Articles

论文

20 世纪的帝国史研究谱系*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任小奇 译/王琼颖 校)

摘要 本文梳理了过去与现在有关帝国史研究的议题。早期帝国史研究常常涉及的五个领域：民族国家兴起前的整体世界史的研究、历史社会学研究、“非殖民化”历程、“区域研究”，以及“伪帝国史”研究。尤其是在 A. G. 霍普金斯从全球史视野研究帝国史的取径得到推崇后，跨学科的帝国史研究、“新帝国史”，以及帝国间的网络与交流成为帝国史研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帝国研究是多元化的，并且在当代史学研究中仍大有可为。

“帝国”一词散发着一一种古老的魅力。它唤起了我们对于专制统治与军事暴力、无视权利平等的最高权威、号令支配广大领土乃至整个世界的各种联想。令人记忆深刻的画面包括尼布甲尼撒的残暴、精力充沛的亚历山大、彼得·乌斯蒂诺夫扮演的尼禄皇帝、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的地球舞、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帝国进行的征服性屠杀、1958 年法国进攻阿尔及尔及 1975 年美国撤军西贡等。正是在帝国形态下，人们形成了对专制权力的最高诉求。因此，即便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象征性需求，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战略性平衡被打破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欣然接受全部帝国式的话语与姿态（乔治·布什 [George W. Bush] 的所作所为尤其明显）。

自历史学发端以来，“帝国”就始终是一个常论常新的基本主题。最

* 本文是作者为德国《当代史研究》杂志专号“20 世纪的帝国”所撰的引言，德文版参见 Jürgen Osterhammel, “Imperien im 20. Jahrhundert: Eine Einführung,” in *Zeithisotrische Forschungen /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3 (2006), 1, S. 4–13。中译文经作者授权发表。（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近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可以主要归结为两种趋势：一方面，“后殖民主义”^①的话语在此期间进入德国社会科学领域；另一方面，美国的自我表现和政治行动唤起了人们对绝对权力想象的联系，它更多被视作最早期帝国所具备的特质。部分仔细检视学术研究空白的学者已经开始讨论一种“帝国转向”。“转向”这一强有力的创新口号将两个策略上的优势联系起来：它界定了一种进步的吸引力（过去称为“范式转变”），这种吸引力只有在自我僵化的情况下才会遭到禁止；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大部分到目前为止的文献资料可能会在重新觉醒的名义下遭到忽视。

目前来看，相比当代研究，许多较早期的帝国研究更容易被接受。这里的问题确切来说在于，史学研究在经过了长期发展之后，更多分布在几个少有联系的讨论范畴之内。其中有五点尤其重要。

第一，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对于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研究通常围绕帝国展开。其范围涵盖了从古代东方学到罗马史，再到对近代早期欧洲扩张以及同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人们立足于此类跨时代与跨地区完成自我运作的模式，长期以来仅满足于一种较低等的系统化进程。近代晚期历史学家的大部分成果也因此遭到忽视。

第二，有关这一主题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当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在1963年——刚好是非殖民化运动的顶峰时期——出版其著作《帝国的政治体系》^②时，这个主题成了讨论的热点，尽管只是初步涉及其中的“经典作品”。这位以色列社会学家只是将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③研究过的结构功能主义运用于前现代的统治结构分析之中，而鲜少关注帝国扩张的动力。他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术语和假

① 后殖民主义（Postkolonialismus）兴起于1970年代，学术界一般把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一书的出版视为后殖民理论时代的到来。后殖民主义批判性地反思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及后果，更多地关注于第三世界并重新界定其民族文化身份与前景。代表学者有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艾梅·赛萨尔（Aim C. Saire）和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以及齐努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② 此书有中译本，参见《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在1950—1960年代曾是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方向，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代表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等。

说,并在后期的文章中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对其加以扩充,至今仍是阐述帝国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约翰·H. 考茨基^①和塞缪尔·E. 芬纳^②等学者则在艾森斯塔德的卓越分析基础上继续深入。但这些文本还有待历史学家继续挖掘。历史社会学的其他思潮也由此受到启迪。例如,最近赫尔弗里德·明克勒^③着手研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对于权力类型的划分,以及各类权力相互转化可能的思考(建立在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力)。查尔斯·蒂利^④关于革命、战争和国家构建的作品,可能十分切合“帝国”这一主题。

第三,英国几十年以来一直有一种“帝国史”传统,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也同样如此(主要是从前的帝国)。英国式的“帝国史”产生于非殖民化的历史经验,其中只有少数对帝国有种乡愁式的怀念。但同时“帝国史”也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领域,必须从本质出发加以探讨,亦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按照不同的混合比例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帝国史。长期以来学界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政治史,但人们不应忽略文化史。比如,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由约翰·麦肯齐首先倡议并身体力行的大英帝国文化史研究^⑤,其多卷本《帝国主义研究》(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中的文化史梳理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文化史导向不仅可以应用于帝国研究,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和帝制的研究。而关于这一主题的德文作品,其形成时间远远晚于“欧洲扩张”概念的出现。

第四,显然,很多“区域研究”的史学问题都是帝国史取向的。它们由于太过明显以至于常常为人所忽视。有关整个北美或澳大利亚早期历史(超越了民族史范畴)的文字材料,在殖民史和帝国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

① 约翰·H. 考茨基(John H. Kautsky),奥地利政治学家,卡尔·考茨基之孙,研究方向是发展中国的政治领域。主要著作有《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变迁》等。

② 塞缪尔·E. 芬纳(Samuel E. Finer),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的不少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代表作有三卷本《政治史》。

③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德国政治学家、战略评论家,代表作有《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等。

④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美国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运动及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⑤ 约翰·麦肯齐(John M. MacKenzie),英国历史学家,主攻帝国主义与大众文化,以及环境史。他的《帝国主义与大众文化》(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1986)一书引领了英国文化史的研究。

位。就大部分非洲地区而言，其历史也大抵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不可避免。当然，要在这里把帝国史和民族国家史区分开，不仅值得商榷，同时也不切实际。一个合乎时代的“帝国史”必须涉及区域、社会、种族和性别的方方面面。

第五，还有一种伪帝国史，一种事实上没有被明确承认的帝国史。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的自由主义“主流”从未将“帝国”这一概念运用于其本国历史的研究之中。这造成了以威廉·威廉斯为中心的威斯康星学派^①被边缘化的局面。但无论是对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还是对美国本土西进运动的研究，都强调其中有着十分相似的进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被视为殖民化或“建立帝国”；而建立大帝国的美利坚式变体隐藏在类似“边疆”或者“天定命运”概念的背后，这些术语本身的禁忌色彩也因此而消解。

可以说，“帝国史”领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展，最晚要到 A. G. 霍普金斯 (A. G. Hopkins) 提出他的帝国史研究思路，亦即，把帝国史视为一种通向连贯的全球史视野的路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依据多样性原则，从“帝国史”中区分出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补充而非各自孤立。

首先，不仅在帝国内部而且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间，按照“帝国”社会化形式的结构特征，寻找一条历史—宏观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结的路径。在这里，中心—外围模式，对典型的帝国演进模式或长时段的霸权主义的历时性思考，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部分的内容涉及概念的精确性，其中权力分配的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且它始终具有一种比较维度。尽管它很容易被公式化的东西所取代，但这在宏观视野下是极难避免的。该方向的出色代表是迈克尔·多伊尔^②、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亚历

① 威廉·A·威廉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美国“新左派”史学代表人物，“威斯康星学派”的创立者和领袖。参见杨生茂《试论威·阿·威廉斯》，《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② 迈克尔·多伊尔 (Michael W. Doyle)，当代著名的帝国研究学者，认为推动国家进行扩张建立帝国的动因是非常复杂的，反对把推动和产生帝国主义的力量仅仅归结为经济或军事因素作用的结果。

山大·莫托尔^①，还有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②和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J. Rieber)。

第二个方向被称为“新帝国史”，但它很少陈述史实。可以将其称之为帝国视野中关于身份认同的历史。在这里，宏观视角有时会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帝国的边界以及帝国与帝国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边疆及与之相关的“混合形态”要比帝国结构的中心的起源更为重要，尽管后者在宏观社会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些最有说服力的作品所描绘的恰恰是边区的居民与外来者。除了个体认同、集体认同之外，这里最受人欢迎的恰恰是“话语”，包括越来越受重视的帝国—殖民地知识。这一方向的代表学者有凯瑟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和贝尔特·孔德鲁斯(Birthe Kundrus)。但与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相比，他们实质上更接近文学研究。

第三个方向，是由彼得·该隐(Peter J. Cain)和A. G. 霍普金斯推动的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新阐释，它将帝国(这里真正强调的是大英帝国和美国霸权)视为大范围内的物质交换与资源运送的网络。即使并未提到经济优先的决定意义，但经济关系在这里显然比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至少当代的)帝国史研究被置于全球化扩展的语境之中，因此帝国不仅代表全球化网络，同时也承担着抵御潜在的全球化缺陷的任务，这既是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一个与大阪大学秋田茂(Shigeru Akita)教授合作的国际研究团队对这一方向进行了修改与拓展。

并非所有研究帝国史的学者都能归入上述三类之中。那些有意提出原创性反对意见的作品，也让众多的读者获益匪浅，例如非洲史学家弗雷德

① 亚历山大·莫托尔(Alexander J. Motyl)，美国政治学家，较少从结构理论的角度对帝国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曾主编《民族主义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著作《革命、国家和帝国》(Revolutions, Nations and Empires)、《后苏联国家》(Post-Soviet Nations)等。参见饶淑莹《世纪之交的帝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7年。

②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美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苏俄问题，以帝国的视角研究苏联。他是极少数在1991年前就预见到苏联必然走向解体的专家之一。代表作《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尼古拉二世》《旧体制下俄罗斯的统治者》等。

里克·库珀 (Frederick Cooper) 和印度史专家 C. A. 贝利^①，二者都是以最稳定可靠的地区特性为背景，反复讨论的中心议题包括殖民主义、国家、民族、全球化、认同、现代性等问题。

当今的帝国研究并不需要将不同的研究方向总括于一个主题之下；当下的多元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帝国研究仍必须面对其他的一系列挑战。其中大多数要求采取详细或概括性的比较。此类比较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有关帝国的历史书写而存在，并在当代面临进一步深化的要求。详细的比较涉及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各帝国之衰落。而概括性比较则意味着，分析各帝国之间业已建立的可比性。就像莫鲁斯·赖因可夫斯基 (Maurus Reinkowski) 以奥斯曼帝国为例所提出的那样，两者之间存在此类可能性——通过研究某一个帝国而得出比较性的结论。

第一个挑战来自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传统对抗。在历史学中，它们通常是被分别研究的。相互对立的研究忽略了这些差别，以至于此类研究结论多少有些过于简单。这可能需要进一步借助于不同的空间构想，就像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所做的那样。由此证明，内部的空间秩序同样包括了人口稠密的核心区、海岸、岛屿和海洋之间的距离。首先是大英帝国，它有时被视为海洋帝国的典型，但它实际上应该被称作“两栖”国家，因为它囊括了地球上几块互相联系的最大大陆（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同样可以有助于更精准地确定帝国边境的类型和功能。仅仅有可移动的和可变形的“边界”标记是不够的。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系统性元素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形式的政体可能在类型学上有比较清晰的区别。但它们处在变化多端的历史和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本杰明·撒迦利亚 (Benjamin Zachariah) 的研究显示，激烈反对殖民统治制度和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可能完全不包括印度殖民晚期的情况。一个富于变化的思考路径可能是最有效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帝国构造”是两个既分离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它们在时间上的联系尤其值得关注。在某些例子中（例如英国和法国），二者彼此都得到了强化。在另一种情况下（例如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帝国结构

① C. A. 贝利 (C. A. Bayly, 1945—2015)，英国历史学家，从事 1700 年以来的印度史、英帝国史和全球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著作有《现代世界的诞生》等。

决定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同时还有另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即一个（海洋）帝国的向心力妨碍和推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如葡萄牙）。反过来，自 1880 年代起，相对发达的民族国家加速成为帝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其中尤其令人难以理解并且在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充分分析的是“帝国民族国家”，亦即在国际舞台上作为超级大国而粉墨登场的那些大国，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殖民帝国，但一方面其内部种族高度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宣传某些普世道德（属于无差别的帝国精英文化遗产）或者至少是要面对这样的普遍性主张，反对其他主张。受此类观点的支配，人们可以在乍看之下截然不同的两大政治对手之间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美国和中国。

中国与美国同样是帝国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样本。众所周知，帝国也有自己的历史。人们在许多帝国文化的自我阐述中就可以找到这些历史。总体来说，上升、繁荣和衰弱的周期性循环（比如传统儒学对“朝代更替”的历史阐释），属于最古老的历史演进模型。但在帝国模式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也必须为单个帝国的发展轨迹标记出明确的时间点。以一些经典问题为出发点，我们知道，目前在讨论中再次开启的主要问题包括：大英帝国在 18 世纪后半叶从“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过渡的可能性；（莫鲁斯·赖因可夫斯基讨论过的）奥斯曼帝国漫长“衰落”的时间框架；或是（特里·马丁 [Terry Martin] 讨论的）沙皇俄国向苏维埃时代的“平权运动帝国”的转变。此后，人们还会追问：当帝国变得更现代时会发生什么？帝国统治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截然不同。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帝国衰落和崩溃上时，也必定会惊讶于一个帝国历经数个世纪仍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当然，有些帝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早期英国的海外贸易和伊丽莎白二世的英联邦之间，几乎不存在结构上的共性。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当代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亦即关于 20 世纪初比较视野中的新帝国主义研究。日本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自 1895 年占领中国台湾岛以来，日本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帝国，而且其军国主义在 1942 年吞并中国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东南亚时达到顶峰。日本所主张建立的“现代化”帝国，完全没有背负它在近代早期扩张时的包袱。它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完整的帝国形态，几乎完全具备经济剥削形式和意识形态

依据，而这正是欧洲帝国形式所缺乏的。在 20 世纪帝国的探讨中，日本可能处于突出的位置。意大利帝国，它起初是共和国，随后转变为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对规模小而且单一，但也在比较视野中获得同等的关注度。而对于苏联及（收缩后的）后苏维埃时代的俄罗斯，专家们一致将其视为拥有帝国结构的多民族国家之延续。

首先，对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它牵涉到美国，这个“真正的帝国”的势力范围在“二战”前实际上只到达菲律宾群岛。美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帝国，至少在 20 世纪上半叶要比在当代更有争议性（参见贝伦茨 [Jan C. Behrends] 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干涉加勒比、“美元外交”和文化输出，是否都可被视作帝国之表现？迈克尔·维尔特（Michael Wildt）对“二战”期间纳粹东扩所做的解答则更清楚：不仅仅是一种采用极端手段来实践民族一种族新秩序的理想与现实被隐藏于帝国话语之中，人们一般称之为“帝国”的统治结构也表现为一些带有等级性和不公平的特征形式。生存空间的概念，早在 1914 年之前帝国主义高级阶段时便已产生；另一方面，最晚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整个西欧的殖民历史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下（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自由邦”），才会发生像“二战”期间德意志东部领土上的居民那样被完全剥夺权利的事件。在谈到近代早期的一些征服事件时，人们会涉及种族灭绝暴行，但后期它却不再成为殖民统治的结构性特征。因此，战争期间纳粹统治的一些结构性延续是一种激进的新发展，并不足以用“帝国”概念来加以完全涵盖。而当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特别是菲律宾、印度和锡兰）已准备就绪，它就被一次次的策划和执行。

“帝国研究”——如果有人想用这样的标签——将很难按照一般的历史分期来进行划分。它要和不确定时间范围打交道：即使人们发现用图拉真时期的罗马类比现代的美国并不可信，但至少还是希望能为最近的那段历史辩护。只关注帝国而忽略了现代早期和 19 世纪的历史使其很难自圆其说。反过来说，也不应高估其连续性，采纳超越时间逻辑的帝国理论同样值得怀疑。各帝国往往经历深刻的变化，不断经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更新。即使是其中最大最有权势的帝国，它在塑造世界的同时也依赖着世界，最大程度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世界贸易的变更、通信手段和军事技术、人口的增长、统治合法性以及对民族—国家属性的理解。